

欣然齋史論集

李亞農

欣然斋史论集

李亞農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欣然齋史論集

李亞農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4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01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開本859×1156毫米 1/32 印張35 3/8 插頁18 字數677,000

1962年9月第1版 196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6,700

統一書號：11074•326 定價：(精)5.15元

510

封面設計：任意

內附友符

6057/27

28

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於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

——矛盾論——

總序

十年以來，著者陸續發表了五本著作，即中國的奴隸制與封建制、周族的氏族制與拓跋族的前封建制、殷代社會生活、西周與東周、中國的封建領主制和地主制等；其目的在於依照一般社會發展的規律來劃分中國歷史的發展階段，並盡可能依照具體的史料來闡述各階段的人民的生活情況。經過十年的努力，著者認為自己總算替四五千年來的中國歷史劃了一個框框。至於這個框框是否比他人劃的框框更圓一些？結論就不應該由著者來做，而是應該讓讀者來做了。

著者在抗戰前，本來是歡喜搞一點甲骨文、金文什麼的。打算在認識幾個契文、金文之後，然後在這些最古老的文字中去研究一點古代社會情況。誰知道一鑽進這些甲骨、鼎彝堆中，便樂而忘返，竟把古代社會的研究置諸腦後，研究起中國古代文字學本身來了。著者曾經把四五年內研究出來的一點寒倉的成果寫在鐵雲藏龜零拾、金文研究、殷契摭佚、殷契摭佚續編等薄薄幾本書中；前三本是以李且丘這個化名發表在抗戰之前的，殷契摭佚續編則是在解放戰爭勝利後才出版的。書的外表雖則寒倉，但在其中研究出來的成果，至今思之，仍不無有一

些可取之處。或者這是敝帚自珍，也說不定。

志在於搞一點甲骨文、金文的人，其沒有搞中國民族數千年來的社會發展史的雄心，不問可知。其後抗戰軍興，書齋中坐不安穩了，只好跑到新四軍去跟着同志們打游擊；光陰荏苒，一打就是十餘年，手不握卷者也是十餘年。本來就只有一點既不淵、也不博的可憐的學問，再加以長期的荒疏，即過去仔細看過的書籍，也必有誤記、忘記之處。寫起東西來就難免有幾條小辮子給人抓着，時常供給人們一點訕笑的材料，也是意料中事。不過著者在這一點上，頗有勇氣；笑罵由他笑罵，文章我自寫之，著作依然是一本接着一本地出版了。每逢給人罵得面紅耳赤之時，便常以敝同鄉蘇東坡的故事來聊以自慰。

坡公寫詩，往往誤用典故，如：以長桑君爲倉公，以摸金校尉爲摸金中郎，或者以葱爲韭之類。誰知當時有一位偉大的、謹嚴而又淵博的學者，其名曰嚴有翼，竟能把坡公的錯誤，一指摘出來，攻擊得他體無完膚。淵博則誠淵博矣！謹嚴則誠謹嚴矣！可是千載之後，中國人民仍然只知道有一個錯誤百出的蘇東坡，並不知道宋朝還有一個偉大的學者——嚴有翼其人。坡公的長處，在於他的絕代才華，而其毛病在於他的粗枝大葉，更嚴重的是在於他的「想當然耳」^①。

著者比他晚生幾及千年，偏偏走上了同樣搖筆桿子的道路；在寫作的本領上，我和我的老

鄉，雖懸殊於才華，却相憐於同病。著者長處之有無，尙在未定之天，而粗枝大葉的毛病，却肯定地遠比坡公厲害。因爲有了如此這般的毛病，曠代的大詩人尙且逃不了臭罵，那就何況區區了。當然，著者假如滿足於引坡公的故事來自慰，而不亟謀匡正錯誤之道，那就太對不起讀者了。所以著者老早下定決心，一俟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就立即回頭去做改訂或增訂工作。屆時如有讀者對於拙著的錯誤提出善意的批評，著者仍舊竭誠歡迎；至於惡意的訕笑，則恕不答覆，著者實在沒有許多精力和時間來浪費筆墨了。

拿研究的進程來說，現在恰好告了一個段落，是應該回頭去改訂一下舊作的訛謬的時候了；拿著者的健康狀態來說，當此駒隙留光、命如朝露之際，也應該是把舊作通盤拿出來整理一下的時候了；假如在糾正舊著的乖謬之前，竟淹忽下世，則貽誤後來的讀者的責任，是逃不了的。所以著者也急於完成改校工作。無奈病體支離，坐以待旦的苦惱的長夜逐漸增加，終日昏昏沉沉，要考慮問題不容易，要提起筆來寫作更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只得向朋友們討救兵了。

十年以來，不斷給病中的著者以協助的楊寬教授，負起了校閱古代史部份的責任；而南北朝、隋、唐史的權威——唐長孺教授也於百忙中擠出時間來，在短期內完成了拓跋族的前封建制的校閱工作；著者十年來的五本論著得以改名爲欣然齋史論集並以現在這樣改印合訂本的形式

式與讀者相見者，皆出於兩君之賜，著者謹於此地向唐、楊兩位老友致以最深厚的謝意。

經過唐、楊兩位老友精心校讎之後，本論集中所有的錯誤，理應悉數消除；如果還有乖謬之處存在，責任當然不在代爲校讎的唐、楊兩位，而在於著者自身了。因爲唐、楊兩位提議修改的有些意見，著者並沒有完全接受。

第一、關於某些歷史事實的理解，唐、楊兩位往往根據着歷代相傳的資料，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著者則以爲舊說雖有來歷，但以不合於邏輯（形式的或辯證的）之故，而沒有接受；如果因爲沒有接受校閱者的意見，而保留了原有的錯誤，則其責任當然在於著者，是十分明白的。

第二、關於同一問題，在前出書中是這樣說的，而在後出書中又是那樣說的，前後矛盾。

校閱者有時也提出了意見，建議改正前說之非，而著者却故意沒有改動；只是在某些地方加了一條註，請讀者參考後出某處，就算了事。因爲著者相信把這種錯誤保留下來，對於讀者不無好處。讀者將由此認識到科學研究是如何逐漸地接近客觀的史實或真理的。科學研究者假如對於他所研究的問題，都已了解透徹，那就根本無須乎再去研究；其所以還須要繼續努力進行研究者，那正是因爲研究者對於他所研究的問題還理解不夠，或者根本上還不理解。例如著者在未寫西周與東周之前，是不懂得什麼叫作夏政、戎索、商政、周索的；盡管前人關於這些問題講得很多，但著者既不能同意他們的說法，而著者本人對於這些問題，也沒有任何理解，所以在

未寫西周與東周之前，只得避而不談。其後，經過不斷的研究和思索，自己認爲已經懂得了這些問題（當然是自己以爲懂得了）；然後將其研究的成果，寫在西周與東周裏，又例如氏族組織與軍事編制的問題，又例如「作丘甲」、「賦甲兵」、「用田賦」的問題，都是後說是，而前說非，著者爲了保留原著的本來面目，對於原文都未加改動，而只加了一條註。又例如商鞅變法，關於他的廢井田、開阡陌的辦法，古今中外，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史學家提出了不同的解釋，我們都未能同意，而自己另外提出了新說。這些說法，在前後各書中，雖無前後矛盾之處，但前略而後詳，或時時在作補充的情況還是有的，這表現出著者在研究過程中關於這一問題有了逐漸的、深入的、更具體的了解；現在把這種一步一步前進的痕跡保留下來，對於後來有志於研究中國歷史的讀者，或者不無幫助，所以亦未予以改動。

第三、中國民族的史前史，姑且不談；單拿成文史來說吧，已長達四、五千年之久。擁有數千萬、數萬萬人口的泱泱大國，則其歷史內容之豐富與紛繁可知。假使沒有一個龐大的歷史學家的隊伍來長期地進行研究，就想要一下子搞清楚這樣一個民族的歷史，那是狂妄的；而著者以一人之力，僅僅花十年的工夫，竟替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發展大致劃了一個框框，其粗疏之處之多，也是可想而知的。著者不是完全沒有聽見有些反對的意見：「你何必那樣急？那樣忙？急急於要去替幾千年的歷史劃框框？你既然那樣匆忙地從事於劃框框，當然就會出漏洞；慢一

點，仔細一點，把一切細小的問題都弄清楚了之後，然後再來替整個中國歷史劃分發展階段也不遲。」但是，我們要說，我們很難接受這種意見。如果真的依照這種研究方法去做，那就應了兩句古話：「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而我們在建立了人民的政權的今天，就必須馬上有一套比較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史來教育人民，那又怎麼辦呢？正如人民政府很快地澄清了黃河之水，把數千年來一直威脅着中國人民生存的黃河，改造成造福於中國人民的黃河一樣，中國現在的所有的歷史學家必須於短時間內很快地協力寫出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比較接近於或者吻合於客觀歷史事實的中國史，以澄清封建主義的或資本主義的混亂的反動的歷史觀點。由於這個工作是必須急的，必須忙的，所以著者才不揣冒昧，寫起中國社會發展史來了。既然寫得很匆忙，那就難免要出漏洞。出了漏洞不要緊，把它彌補起來。今天我們在中國從事於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的學徒，只可能抱着這樣的態度去做研究工作。今天中國的歷史學家不可能把一切細小的問題都先弄清楚了之後，再來寫新的中國史，而只能抓着關鍵性的問題來加以研究，加以解決，以便依靠這些骨幹架子，盡可能迅速地寫出一本比較正確的中國通史來。這種做法本來就是可能出漏洞的，再加之以著者的個性的粗枝大葉，就更加重了這一毛病。今當出版合訂本的時候，雖然得到了唐、楊兩位教授的熱情的幫助，彌補了不少的漏洞，但由於著者的漏洞太多，恐仍有不少漏了網的漏洞。經過這番校讎之後，本集中如果還有未及校改的錯誤，仍應

由著者來身任其咎，這是理應申明的。

著者在朋友們的不斷的協助下，不單是大致完成了替中國史劃分階段的工作，而且能够在有生之日，完成了校改工作，這使著者大大地感到鬆了一口氣；而今而後，貽誤後來的讀者的責任，其庶乎可以減輕一點。當此論集完成校改工作，行將付印之際，著者一方面雖然私自慶幸得到了減少一點貽誤讀者的責任的機會；但另一方面也感覺到今天我們對於一本書的要求和態度應該如何？還須考慮一下。

假使說，一本書的內容須要做到絕對沒有一點錯誤，才算是一本好書，那末，著者就懷疑古今中外是否曾經有過這樣一部書；連馬克思自身的著作，最低限度，早期馬克思的著作以及由黑格爾左派到新世界觀的樹立的轉換期的著作，甚至於成熟期的著作——共產黨宣言（也因其第一句之故），都在可以付之一炬之列；又假如讀者對於一本書的要求，只在於採其可取者而棄其可去者，則很多著作（一無可取的誨盜誨淫的東西以及洋洋灑灑動輒數萬言而沒有一句說得對的八股文除外）對於一個讀者來說，大都是開卷有益的。我們讀一本書，主要是想從中得到一點好處，來作為自己的營養；而不是爲了專去找壞處來填滿自己的腦袋。請問！你拚命去找壞東西來填滿自己的頭腦之後，又將何所用之？誠然，在有營養的東西裏面，有些不免包藏着毒素，一切具有健康的生理機能的人，都應努力於吸收營養而排除毒素；一切具有健全的

理智的人，也應作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努力，而對於書中的是非好壞，必須有所批判和辨別。然其所以要去粗，主要地爲了取精；其所以要去偽，主要地是爲了存真；其所以要排除毒素，主要地是爲了吸取營養。倘若終日專從事於排除毒素，日日沉溺於排除毒素，而竟忘去了吸收營養，即使是一個壯健無比的漢子，吾將見其很快地陷於氣息奄奄，朝不保夕的險境。

說到這裏，著者不能不想起康德哲學的遭遇。從消極方面來批判康德思想的反動性的文章，真可以汗牛充棟；而從積極方面來研究康德，企圖去其粗而取其精，去其偽而存其真，以作爲無產階級的哲學的營養，以作爲發展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因素的文章，却寥若晨星。康德哲學之爲反動的觀念論，吾久已知之矣；康德哲學之爲不能自圓其說的二元論，吾久已知之矣；對於康德哲學的批判似乎不必再多費筆墨了！而有些哲學家們却樂此不疲，永久地在那裏批判，而不見其從中吸取營養來發展新的哲學。難道康德哲學竟是一無菁華可取的糟粕麼？恐怕不是這樣罷。

我們知道，康德的哲學是繼英國的哲學家休謨的懷疑論之後而出現的哲學派別。休謨的懷疑論否認了人類認識客觀真理的可能性，而當時自然科學的進步，都天天在證明客觀的真理是可以認識的；換一句話說，休謨的懷疑論天天都在挨耳光。康德爲了解答休謨所不能解答的問題，於是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學體系——二元論的觀念論。一方面承認有法則可尋的自然界的存

在，他方面又承認有人類的認識能力所不能達到的「物自體」和不受任何自然法則約束的自由的精神的世界。康德本人認為，這樣就可以克服休謨哲學的弱點。但是我們知道，在哲學史上，一切二元論都是不能自圓其說的、自相矛盾的理論；所以在康德之後，又出現了費希特的主觀唯心論，企圖彌補康德的漏洞。費希特認為絕對的「自我」是他哲學的出發點，世界及其一切規律都是絕對的「自我」從自身中創造出來的；從而在說明客觀世界之所以存在，以及如何去認識這個問題上，雖然避開了康德所碰着的暗礁，雖然在理論上避免了二元論的弱點，其奈他自身的條理暢通的極端的唯心論，是完全不符合客觀事實的空論何？誰在宇宙中又曾經看到過一個「自我」在那里創造世界呢？這種極端的唯心論是很難說服人的、軟弱無力的荒謬的理論。費希特在耶那大學的講座的接班人是謝林，他爲了彌補他的前任者的缺憾，提出了同一哲學（物質與精神的同一）的原理。可是當他的哲學還沒有來得及在各方面發生重大影響的時候，他的微弱的呼聲，已爲抱着同一目的而登場的、風靡一世的黑格爾哲學所壓倒了。至於黑格爾哲學，純就其理論來說，好像一個五官端正、四肢俱全的人，幾於無懈可擊；可是用客觀的存在來作標準一檢查，就變成了兩脚朝天頭着地的怪物，所以，隨黑格爾之後而來的費爾巴哈却從唯心論轉到了唯物論。

馬克思便是站在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費爾巴哈的唯物論的基礎上建立了他的新世界觀——辯

證唯物論，從而攀登上了人類的哲學思潮的最高峯。馬克思的哲學思想既然對於人類社會作出了偉大的貢獻，則飲水思源，我們就無法否定黑格爾哲學對於人類社會的貢獻；我們既然無法否定黑格爾在哲學上的貢獻，我們又怎麼能夠否認黑格爾哲學所依據以成立的先行哲學家們的貢獻呢？試看康德的名著純粹理性批判中的十二個範疇，在黑格爾的大、小邏輯（或辯證法）中佔着何等重要的地位，就可以證明著者的言之非誣。

肯定康德哲學貢獻（不單是康德，其實是先行於馬克思的一切哲學家的貢獻）的時候應該到了。著者記得兩年前曾經在一本外國雜誌上看到一位哲學家寫了一篇文章，標其題曰：偉大的康德。對了！我們已經充分地談過了康德的反動性，再談也沒有啥味道，反正說來說去不過是那幾句話，早已變成了老生常談，何必再去談它！現在是應該談一談康德的偉大的時候了。去其粗而取其精，並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面來發展無產階級的哲學和社會科學的時候應該到了。及至讀完了這篇文章之後，著者不禁大失所望。原來這位哲學家仍然花了十分之九的篇幅去批判康德的久已耳熟能詳的反動性，而僅僅用了十分之一的篇幅來談康德在天文學上的成就。他並沒有談出康德之所以偉大，而只談了康德之所以渺小。試問我們怎麼能夠從這樣的研究中去其粗而取其精，以發展新哲學，以建設新文化呢？

「是存在決定意識，而不是意識決定存在。」由於這一真理太有名了，誰都知道，人們往

往因此而忘去另一真理，即：「思想一旦形成體系之後，它就具有它自身的發展規律」。每一思想體系都爲客觀的存在所規定，都是當時的客觀的存在的反映，都是客觀的存在的產物；同時，每一思想體系皆爲先行思想體系所規定，都是先行思想體系的必然的發展，請讀者試一回顧近代和古代的哲學的發展過程，就很容易理解後一條真理跟前一條真理同樣是顛撲不破的，當我們站在馬克思的偉大的著作前面，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潮之偉大。這些東西正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的源泉。馬克思用盡了心血來研究了這些東西，但是他並沒有替我們代勞，我們還必須親自再去下一番苦工，才能真正有所收穫，我們不能只抱着一部資本論去大談其經濟學（最近王亞南氏在人民日報上提倡研究古典政治經濟學，頗有見地）。作爲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假如我們只讀幾本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即引以爲滿足，那我們不單是沒有任何資格來建設無產階級的新文化，甚且會喪失理解馬克思主義本身的能力，因爲馬克思的著作本身，都是淵源有自的。沒有打好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就沒有透徹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可能。

爲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文化，我們不單是應該研究資本主義時代的古典著作，並且還需要研究人類一切時代的古典，從中吸取營養。誰都知道人類的社會生產力是跟隨着社會的發展階段而發展的，人類所創造的文化一般地是跟着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的，但並不一定所有文化都

是如此。例如歐洲封建時代的社會生產力雖比奴隸制時代的生產力爲高，但中世紀的文化（當然，我們不能忘記這個時代的識字的人數的增加和文化地區的擴大，也不能忘記這個時代木犁變成了鐵犁），却遠不如古典的希臘文化之絢爛奪目；尤其是在詩歌和雕刻方面，馬克思簡直認爲希臘人的創造力發揮到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程度的。我們完全同意馬克思的看法。試將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最偉大的雕刻家米開朗琪羅和近代法國最偉大的雕刻家羅丹的作品和希臘雕刻比起來，我們不得不承認前二人比後者仍有遜色（米氏的毛病有專名叫筋肉過多症）。

今之有志於雕刻藝術者，如果要向古典文化吸收營養的話，那你就必須去向古希臘的雕刻家學習；如果你不去向希臘雕刻學習，而專向其他的國度或其它時代的雕刻學習，雖然同樣可以學到一些東西，但你却是在去其精華而取其糟粕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能够創造出光輝燦爛的偉大的社會主義的新雕刻藝術呢？我們必須繼承人類的一切優良傳統（注意：筆者在這裏只是說繼承優良的，並沒有說要繼承惡劣的；當然，稱這種繼承爲批判的繼承亦可），然後站在這個基礎上去開闢前人未踏的新境界，去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又例如：

「中國新詩的前途，在於很好地去研究古典和民謠」，這也是近年來流行於我國的非常有名的一條真理，而且是被中國文學史不止一次地證明其爲顛撲不破的真理。宋詞和元曲都是結合古典與民謠然後產生出來的生機活潑的新形式的詩，這是熟悉中國文學發展史的人，誰都不

能否否認的歷史事實。所以這一條真理，對於中國的新詩人來說，是極端重要的。可是，我們必須知道，所謂要「研究古典與民謠」，乃是既要研究民謠，同時又要研究古典的意思；並不是叫些人來寫幾首五個字一句的詩，或七個字一句的詩；再叫一些張三李四來隨便寫幾行既不押韻，唸起來又不順口的七長八短的句子，就算研究了「古典與民謠」。更明確地說：就是必須要結合民謠與古典來同時進行研究，並由此而創造出一種既非古典，也非民謠的另一形式的新詩，這才是這一條有名的真理的真諦。而且這一真理暫時還不是向今天中國一般羣衆說的，在今天就要求一般羣衆去研究古典，似乎還做不到；如果今天一般羣衆真要爲了新詩的前途而忙碌，那恐怕是白忙了。研究古典，去其粗而取其精（把過去詩詞中值得繼承的繼承下來），更結合今天的民謠（民謠是在羣衆中自然產生的歌謠，而不是叫張三李四硬擠出來的吶喊）所表現的新的生活、感情、思想，來創造富有生命力的新詩，這對於今天中國的新詩人來說，實責無旁貸。

要創造新的，就必須繼承過去一切值得繼承的；因爲這樣做，不單是可節省許多勞力，更重要的是能够避免走錯路，栽筋斗；這樣做法，實爲避免碰得頭破血流的最好的保障。所以說，繼往實所以開來。辯證法中最主要的概念之一，就是「揚棄」（在小邏輯和大邏輯中出現的次數最多。何止千百次，比任何其它概念出現的次數要多得多，由此可知其重要性。捨此，